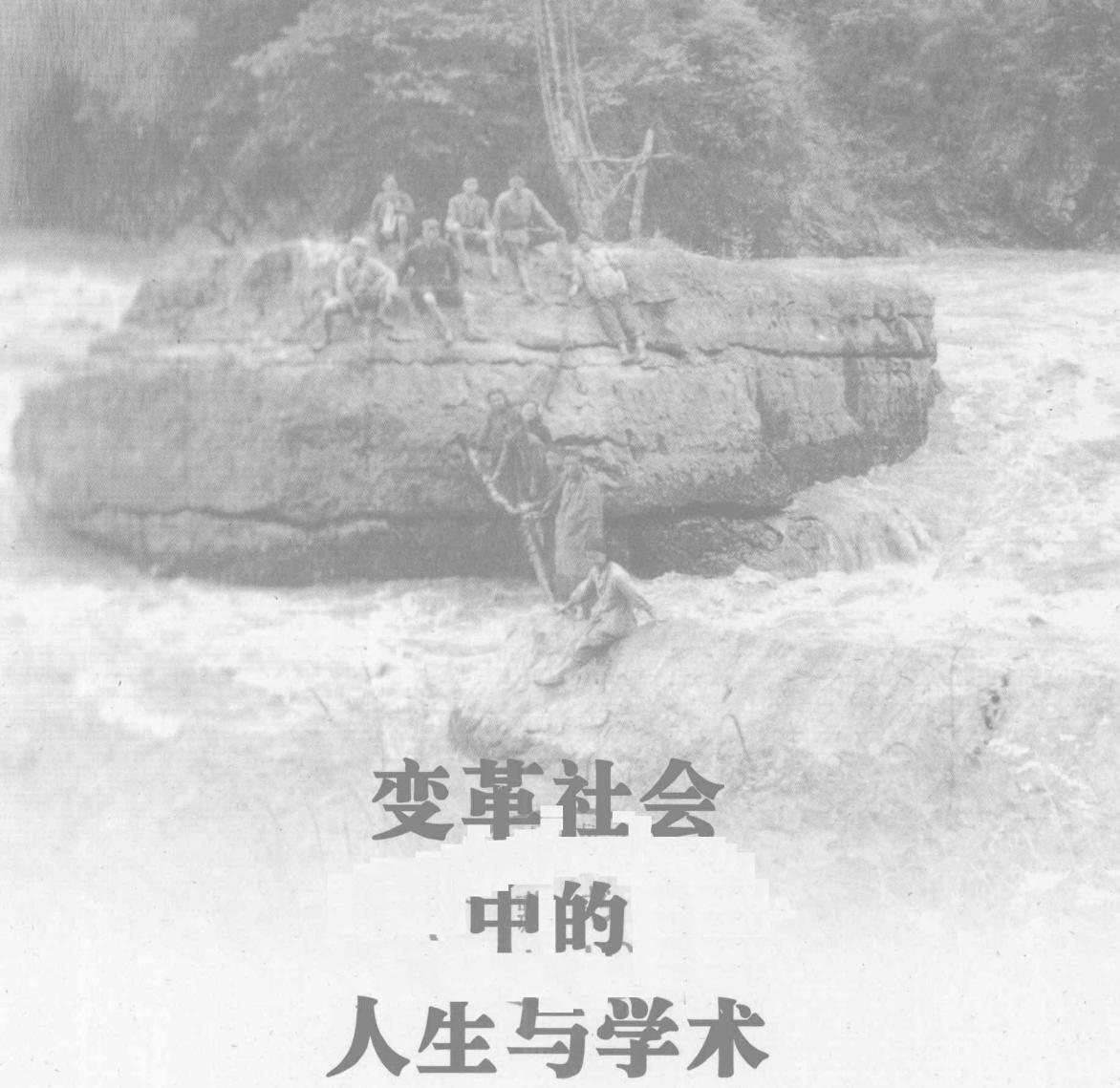


李绍明 口述 伍婷婷等 记录整理



变革社会中的 人生与学术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变革社会
中的
人生与学术

李绍明 口述 伍婷婷等 记录整理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变革社会中的人生与学术/李绍明口述，伍婷婷等记录整理.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9.6

ISBN 978-7-5062-9314-3

I. 变… II. 李… III. 李绍明—自传 IV. K8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25956 号

变革社会中的人生与学术

口述者：李绍明

整理者：伍婷婷 等

出品：吴兴元

责任编辑：方理云逸

出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发行：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北京朝内大街 137 号 邮编 100010 电话 010-6401-3086)

销售：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本：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19 插页 3

字数：230 千

版次：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教师服务：teacher@ hinabook. com 139-1140-1220

读者咨询：onebook@ 263. net

编辑咨询：133-6631-2326

营销咨询：133-6657-3072 010-8161-6534

ISBN 978-7-5062-9314-3/C · 54

定 价：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整理说明

2006年10月，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大学的几位博士研究生在王铭铭教授的带领下，赴四川成都、阿坝州等地参加由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和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共同组织的“西南地区民主改革口述史调查”活动，在成都的一次培训报告会上与李绍明先生有了一次较为深入的交流。李先生时年七十三岁，已经从四川民族研究所的工作岗位上退休多年，但每年仍应邀参与大量的学术活动。他精神矍铄、谈锋颇健，对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科的热爱与洞见表露无遗。他既是教会大学在中国大陆的最后一批学生之一，也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民族学研究者之一。他既是田野工作的践行者，足迹几乎遍布西南藏区、羌区和彝区，也参与推动了诸多学术研究机构的创立并担任过领导者角色。更为难得的是，李先生从事学术活动的时间超过半个世纪，亲身经历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历史上的诸多重大事件，他对学术历程的回忆简直是信手拈来、如数家珍，内容引人入胜。王铭铭教授敏锐地意识到，李先生丰富的个人经历和人类学/民族学这门学科在建国以后的发展历程交织得如此紧密，如果能对李先生进行深入系统的访谈，并将访谈材料整理出版，窥一斑不仅可见建国后学科史之全豹，更可能在学术史的研究上探索出一条新的路径。在王铭铭教授的建议下，几位博士生迅即着手搜集相关的背景资料，拟订访谈计划。事情往往就是这么有趣，李先生原是来给我们的民主改革口述史调查作动员和培训的，但最后自己却成了我们的访谈对象。

李绍明先生 1933 年出生于四川成都，土家族。1950 年考入华西协和大学社会学系民族学组学习，两年后因院系调整进入四川大学历史学系，1953 年又进入西南民族学院民族问题研究班。1954 年李先生毕业后，执教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民族干部学校，正式开始从事少数民族研究工作。1956 年，中央集全国人力、物力组织开展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李先生随即被征调入四川调查组，到凉山彝族地区参加社会形态调查。此时，凉山部分上层的彝族因不满正在进行的少数民族民主改革而发动叛乱，于是 1957 年李先生又被抽调加入临时组建的中央慰问团，从事平叛抚慰工作，历时数月。中央下达编写少数民族三种丛书的任务后，他于 1959 年离开凉山，赴云南参与编写《彝族简史》的工作。1961 年又回到四川的羌族分组继续进行社会历史调查，直至 1964 年整项工作全部结束为止。在“肃反”、“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等历次运动中，李先生经历了人生的三起三落，但仍坚持寻找各种机会进行学习和研究。在“文革”结束后中国社会科学重建的过程中，李先生积极参与了中国民族学学会、中国人类学学会的筹建并担任部分领导工作，先后担任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所长、西南民族学学会会长等职务，在西南地区倡言、主持并亲自参与了多项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调查研究，如“六江流域”（后来学界习惯上根据费孝通先生的说法，将之称为“藏彝走廊”）综合考察，和其他学者一道提出如“南方丝绸之路”、“康巴学”这样的学术构想。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他发表了大量专业论著，计有《羌族史》（合著）、《民族学》、《李绍明民族学文选》、《巴蜀民族史论集》等专著，主编《雅砻江上游考察报告》、《雅砻江下游考察报告》、《葛维汉民族学考古学论著》、《（马长寿）凉山罗彝考察报告》等书。

类似这样的介绍，在关于其他学人研究的各类出版物里也早已屡见不鲜。但是，得其扼要之余，我们也丧失了对丰富细节的感受，丧失了对人生起承转合头微妙、精深之处的领略。

入大学时，李先生为何偏偏选择了民族学科？四年间辗转三个学校，不同学术传统的训练会在李先生身上留下怎样不同的印迹？作为专门化知识体系下培养出来的新学者，李先生身上还会不会留有旧学的影子？人生和学科的命运各自起起落落，外部环境和内心思绪都纷繁复杂，当李先生回首往事的时候，他究竟又如何看待和评价？这一切，只有在李先生逸兴横飞的谈话中才有充分的答案。

李先生个人的治学成就和师表风范，足以成为后辈的楷模，这一点自然毋庸置疑。但是，本书的意图从一开始就不仅限于展示李先生的个人学术生涯。个人的口述生命史和学科历史（或是历史的某一片段）之间可以产生怎样的勾连，似乎更是我们关注的题中应有之义。

清末民初，西洋学术东渐，中国知识传统也逐渐纳入西方的学科规范体系，各种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孕育生成，现代学科史研究也相应产生。受编年史观影响，人们常把历史与时间直接对应起来，认为撰写历史就是在刻度时间。学科历史的撰写也不外乎如此，从这个学科的产生、发展、衰退，首尾纵贯，一气道来。学科编年史固然大有可观，但也有其缺憾，那就是只见其事而不见其人，若能见其人则不见其心。明末清初黄宗羲撰《明儒学案》，开创了以学案体撰写中国学术史的先河，这种以人物为核心的纪传体写法，一定程度上则能弥补编年写史的欠缺。因为人是学术传承的灵魂，学术的历程实际上即可视为学者为学的经历。若论学者之为学，自然首要观其著述文章，次观其经历行状，也就是说，学术、思想的发展就寄寓在学者所“言”所行之中。但是，学者所“言”难道仅限于其著述文章吗？这一点却是大有必要继续辨析。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时说：“‘对话’（dialogue）比‘讲课’（lecture）更有价值，原是世界学术史上的通例。……主要的原因便是‘对话录’所记的往往都是些脱口而出的老实话，不像那些三思而后言的‘讲学’、‘说教’等的官腔官调也。”讲学、说教都被唐先生说得如此

不堪，那么精心推敲增删的著述文章岂不是更加左右支绌？话虽偏激，但至少说明了，知识分子的口述史对于学术史研究是有着特殊意义的。

那么，在李先生几近四分之三个世纪的回忆里，我们究竟可以捕捉到什么样的鲜活信息呢？首先，20世纪80年代以前，李先生几起几落，甚至一度身陷囹圄，人生可谓饱经曲折跌宕。照常理来说，必定是会有不平之鸣的，或者可以像一些知识分子那样，采取不合作态度。但是李先生却仍能矢志于学术研究，并且以其学术观点来论证和诠释国家的民族地区政策和治理。到了晚年，李先生的社会活动和学术活动依然活跃，看似荣耀备至，但李先生私下里却不免啧烦，且对时弊颇多针砭。在他的身上，政治忠诚和恪守道统的观念既纠结又彼此分裂。其次，李先生受过现代人类学/民族学的学术训练，使得他在西南各主要民族源流及社会组织形态的研究上都颇有建树，自20世纪80年代初起，对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藏彝走廊”概念也大为激赏，先后组织了“六江流域”、“南方丝绸之路”综合考察，与费先生对于民族地区研究必须关注交往与流动的新见解遥相呼应。最后，李先生的研究广泛涉及藏、彝、羌、土家各族，而非专于一务，无疑都自觉服从于民族—国家建设和统一的需要，但却始终没有泯灭对地方的关注。他在访谈中多次提到，在他的大学时代，见过梁钊韬先生手绘的一幅西南地图，其时西南的区域远大于今天行政区划上的西南，这一幅地图既激发又框定了李先生对西南地区特殊性的探究，这与华西大学民族研究的旨趣又有某种程度上的暗合。

正是为了重现这些“脱口而出的老实话”，我们特意选择了对话体的形式，甚至一些过于口语化、略显繁复的内容也未作处理，其目的就是为了让读者像采访者一般进入当时对话的氛围，尝试着从问题意识出发，去理解李先生的讲述。此外，我们把发问者的名字隐去，其缘由一是传主的讲述才是本书重点，二是首次采访为集体

劳动，发问者较多且各有侧重，为免枝蔓芜杂，故有此举。

从 2006 年 10 月起，第一批采访者在成都用了三天时间，采访李先生六次，这一段访谈将李先生的人生经历粗线条地勾勒了出来，曾穷石、舒瑜在此基础上整理出了一篇近十一万字的初稿（最后在本书中被采用约六万字）。2007 年 6 月，伍婷婷赴成都再访李先生，在初稿的基础上，补充了李先生人生经历的诸多细节，加入了他与诸位师长交往的回忆，这次访谈着重从学科史的角度探讨他所经历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转变历程，总共历时九天。2008 年 9 月，伍婷婷二赴成都，就一些疑难和较为关键的问题与李先生进行核实、探讨。最后，经过近三个月的反复修订，形成了本书的终稿。

采访、整理、出版的过程能够顺利完成，首先要感谢李绍明先生的慷慨相助：他不但思维敏捷、记忆清晰，带采访者回到半个世纪前作了一次时光穿梭，而且在生活上对他们也诸多关照。其次采访过程一直得到诸位师友的悉心指导和帮助：王铭铭教授建议并促成了这次采访，而且从选题、整理、审稿到推动出版都付出了大量的心血；西南民族大学的杨正文教授、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彭文斌研究员提出过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并提供了实质性的帮助。同时还要感谢一起工作的同伴们：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曾穷石、张原、汤芸，北京大学博士生舒瑜、陈乃华，以及西南民族大学硕士生王田、杨映、杨雪、马志华等。他们都参与了第一次采访，其中曾穷石、舒瑜为主要提问者，汤芸等收集整理了李先生的部分老照片，张原、王田担任摄像，其他同学协助提问。最后必须提到的是先于我们访谈过李绍明先生的两位同行，她们是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王林女士、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的李锦女士，在进行访谈之前我们参考过她们发表的相关文章，从中获得了诸多启发。这些文章是：王林录音整理的《1950—1960 年代的民族调查》、《我与凉山奴隶制研究》、《我与羌族研究》、《四川的民族识别》、《我所知的四川考古、文博事业》及《我的民族学田野调查研究生涯》等，分别刊

载于《当代史资料》2003年第3—4期，2004年第1—4期；李锦录音整理的《李绍明先生访谈录》，刊载于《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动态》2007年第1期。

作为后辈，我们敬仰李先生的人品学问、道德文章；作为学科史的研究者，我们的出发点是，通过对李先生人生经历的讲述，折射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在20世纪下半期的曲折历程和观念转型。个人的历程可能就是一个学科的历程，学科的命运可能就是一个国家的命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彼此了。

伍婷婷

2008年11月8日

目 录

整理说明	伍婷婷 1
第一章 我的少年时代	1
一、我的父亲	3
01. 出关是个苦差事	3
02. 康巴第一批人才	7
03. 治藏必先安康	13
04. 当了官没地方管	16
05. 草鞋县长	21
06. 认识我母亲	24
二、我大学前的经历	28
01. 入学奇遇	28
02. 学医？学社会学？	34
03. 动荡时局中的家庭	41
第二章 特殊的求学经历	47
一、华西大学	49
01. 教会大学	49
02. 洋教士葛维汉	53
03. 李安宅的十年	59
04. 非平常时期	63
05. 他者就在边上	67

06. 边研所随军入藏	71
07. 艰难向前走	74
二、在华西的学习与实践	81
01. 换汤不换药	81
02. 豆选乡政府	89
03. 第一次接触彝族	98
04. 两次遇险	102
05. 为重心工作服务	105
06. 人类学的门槛	109
三、四川大学	112
01. 土气、洋气与宝气	112
02. 历史系里学民族学	118
03. 隔阂和震荡	122
四、西南民族学院	131
01. 第一届“研究生”	131
02. 两种苏联学术传统	136
第三章 我所经历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141
一、阿坝州民族干部学校	143
01. 川主庙里上大课	143
02. 第一次起落	151
二、社会历史调查组	155
01. 不读研究生，将来教研究生	155
02. 50年代的辉煌	159
03. 凉山彝族社会调查	164
04. 凉山奴隶主叛乱	170
05. 背靠背的斗争	176
三、经历社会运动	186
01. 学科受到重创	186

02. 生产与学术“大跃进”	192
03. 第二次起落	198
第四章 “文革”时期的际遇	207
一、第三次起落	209
二、“假公济私”西藏行	219
第五章 新学期的学术作为	221
一、重返凉山	223
二、推动学科建设	229
01. 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分合	229
02. 补课	236
03. 理清自己的家底	238
三、创立西南民族研究学会	242
01. “大西南”	242
02.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	246
03. 推到风口浪尖上	251
第六章 师友交往杂忆	253
一、了不起的费孝通	255
二、坚持学术原则的马长寿	263
三、风趣平易的冯汉骥	271
四、执着敬业的李安宅	274
五、谦谦君子吴泽霖	279
六、提携后辈的林耀华	282
七、亦师亦友宋蜀华	285
出版后记 让历史开口说话	289

照片目录

图 1	身着广益幼儿园园服	29
图 2	小学时与母亲的合影	40
图 3	华西大学社会学系师生合影	88
图 4	1951 年暑期前往阿坝州茂县黑虎乡调查途中(一)	90
图 5	黑虎乡调查途中(二)	93
图 6	黑虎乡羌族一家	94
图 7	1952 年前往乐山峨边调查途中	103
图 8	前往乐山峨边调查途中过河	106
图 9	华西大学社会学系同学合影	114
图 10	50 年代成都西南民族学院大门	132
图 11	身着各族服装的研究班学员	135
图 12	阿坝州教书时期工作照	144
图 13	阿坝民族干部学校学员访问成都	147
图 14	凉山社会历史调查时期的戎装照(一)	160
图 15	凉山调查组为彝族画像	161
图 16	四川民族调查组成员在讨论	166
图 17	四川民族调查组成员在雷波县与彝族合影	167
图 18	戎装照(二)	173
图 19	凉山州布拖县县城外欢迎中央慰问团	178
图 20	四川民族调查组在赴布拖县途中休憩	182
图 21	1957 年夏中央慰问团发放救济粮	184
图 22	凉山州昭觉县雪景	190
图 23	1963 年四川调查组部分成员合影	203
图 24	1983 年海南三亚考察合影	244
图 25	1991 年 10 月陪同费孝通先生考察川东南酉阳土司衙署遗址	261
图 26	1957 年秋四川灌县与四川民族调查组同仁合影	266



第一章

我的少年时代

我认为学医只能救单个的人，学社会科学可以救国，当时就是这么想的。另外一个原因跟我父亲有关，他本人就在民族地区生活工作这么多年，对我热爱社会科学有很大的影响。

一、我的父亲

01. 出关是个苦差事

问：我看到过以前对您的访谈，主要谈的是您的学术经历，这次我想谈得更宽一点，想请您从自己的人生经历并结合这个学科（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经历来谈谈。

李：好，好。

问：那就从您小时候开始聊吧。您是土家族，那老家在哪？

李：土家族在我出生之前、包括我出生后的这代人，都没有被认定为一个少数民族。土家是个民族，是1950年的国庆节湘西的代表田心桃去北京开会时首次提出的事。被识别出来是潘光旦先生等人去了以后，50年代的时候才有这摊事。那个时候在我们老家，当时不说是土家，说是苗族。这个地方在潘光旦先生等人都去以前，倒是都认为是少数民族，但究竟是什么少数民族还不知道，只说是苗族，但这个“苗”是很广泛的（说法），是个少数民族的代称。比如仲家的“苗”，水家的“苗”，什么都是“苗”，它成为一个少数民族的代称。那么，我们这代听说自己的先民都是“苗”，但不知道是“土家”，没有这样的叫法。一直到潘先生1955年写了《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这篇文章之后，才确定“土家”这个名，1957年中央才确定了这个民族。土家以前也叫“土民”，土民就是“土著人”的意思。

我本人不是出生在老家，我的父亲是。老家就是现在重庆市的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那个时候不叫这个名字，叫做秀山县。我父亲出生在这里，他叫李亨，清末出生的。他出生的时候家庭比较贫苦了，但也不是很穷，如果按新中国成立后划分成分的标准来看的话，可能属于中农。家里还是有点田地，不多。我们这个李姓家族，在秀山是个大姓。听说以前家里还是很有钱的，但到我祖父的时候已经败落了，怎么败落的不知道。我父亲那个时候上过私塾，清末那个时候，这个地方是没有新式小学的，是比较偏僻的地方。

问：是在秀山县里的私塾？

李：不是，私塾是乡里的，教四书五经嘛。有一个老师、一些儿童嘛，念《三字经》什么，受的是传统的国学教育。秀山这个地方虽然是少数民族地区，但清朝乾隆的时候就已经改土归流了，而且那个地方离县城也不太远，大概是十多二十公里的样子，不算很偏僻，所以在那里汉学教育已经有了。就这样我父亲在老家受了一点初级教育，可是他很勤奋，后来是自学成才的。

后来，他年纪大了一点，可能十多岁不到二十岁的样子，就去了酉阳。酉阳那个时候是个州，州给（四川方言，“和”的意思）县不同，酉阳当时是个直隶州，好像就是现在地区一级的，它管下面的县，秀山就是酉阳州管辖的一个县。酉阳州以前有酉阳土司，是一个土家族比较大的土司，土司下面管了四个长官司，也是土司，不过是小土司。我们那个地方，以前是土司管辖的地方，但清末的时候土司已经没有什么力量了，实际上清朝政府已经进去了，已经管了那个地方，汉文化已经进去了。

酉阳州清末已经办了新式学校了，这个学校现在还很有名。（问：酉阳第一中学？）对。但是那个时候不叫中学，就叫学堂，一个新式学堂，叫西属学堂。我父亲去酉阳后，正好学堂招收工友去做工。干什么呢？上课的时候要敲钟，到时间了就打钟，下课上课都要打。当然也不止是这一个任务，他给我讲，打钟以后还有一些杂事。这些事很快就做（完）了，于是他就去旁听，跟着那些班去旁听。所以他在学堂里又自学了东西。